

贺中令用雕塑展现民族魂

本报记者 凌鹤

核心提示

《残历碑》是沈阳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纪念雕塑,更是一座匠心独运,蕴含民族魂的经典雕塑。其设计和创作者为新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家、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贺中令。民族情怀和大爱情思一直是贺中令雕塑的主旋律,其创作的经典作品影响深远,表现出厚重历史和民族精神,激励时人奋发进取。

一本永远翻开的日历成为雕塑史杰作

《残历碑》于1991年9月18日落成。碑高18米,宽30米,进深11米,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。由混凝土灌铸,花岗岩贴面,外形呈一部翻开的残破台历,其左页以文字镌刻着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的简要经过,右页为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的具体年月日与累累弹痕构成的骷髅。残历碑下方呈空心,辟为纪念馆,展示陈列着有关“九一八”事变的历史资料和文物。碑文由著名鉴赏家、书法家杨仁恺题写。残历碑右面刻着“1931年9月18日,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”的字样,向人们昭示着那个永远难忘的耻辱日子。《残历碑》不仅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一本永远翻开的日历,更是一本令人掩卷深思的史书,凝聚着中华魂,展现不屈不挠的气节,警醒着勿忘国耻,振兴图强。多位专家评论:“《残历碑》是一个特殊的创造,是雕塑艺术史的杰作。”据统计,仅在1998年,就有中外18万余人次参观《残历碑》。

孜孜以求不断汲取中外艺术前辈的宝贵经验,探求自己的艺术风格。天赋、家教、学院的培养,造就了一位新中国雕塑中坚。

1964年,贺中令在辽西发现两块木化石,自然天成的形状像一本翻开的台历。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一个不凡的雕塑构思。1984年,全国城市雕塑领导小组征集各个城市的代表题材作品,“九一八”事变包含其中,贺中令作小稿时灵感迸发,根据那两块木化石的造型,结合史实塑造出《残历碑》,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,这件作品荣获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优秀奖。

1991年3月,“九一八”历史博物馆雕塑招标会在沈阳举行,贺中令的设计从62个方案中脱颖而出,6月正式动工,3个月后,贺中令高质量完成了工程。因为艺术作品不是规矩的施工图,施工人员离不开贺中令每天在工地上指导。《残历碑》建成时,背面曾留有设计者落款处,但贺中令坚决不同意,他说:“人们应该记住的是那段历史,而不是这个建筑的设计者。”

拳拳爱国心是创作的最大动力

贺中令进行艺术创作十分忘我,并追求完美,甚至不惜面临生命危险。他在创作以抗日英雄杨靖宇为题材的石雕《白山魂》时,一次正在采石头,被采石场的炮震昏;一次运送作品时被严重砸伤,但贺中令并未因此而放弃创作,放弃对艺术的高标准。贺中令是吉林人,对长白山了如指掌。在创作《白山魂》前,多次走访杨靖宇将军牺牲地。他自述:“绕白山十数日,跋涉数百里,最后看中这块石头,把它从一大块完整的山岩上开采下来,运回自己的工作室,怀着敬畏之情,将英雄杨靖宇将军的遗容雕刻了出来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石块原有的品貌。”以烈士牺牲之地开采出来的石头,化作英雄安眠之面目,艺术作品的形与神浑然天成。

数十年如一日,贺中令以稳健扎实的雕塑基本功、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力以及饱满旺盛的创作状态,雕塑出一个个鲜活逼真的人物形象和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时刻,这些作品或恢宏壮观,或雄浑厚重,或文质优美,他的《白山魂》《流亡曲》《残历碑》等作品都是抗日题材雕塑的经典代表作,彰显拳拳的爱国之心。《白山魂》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,木雕《骨肉同胞》荣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二等奖,《一衣带水》荣获全国城市雕塑展优秀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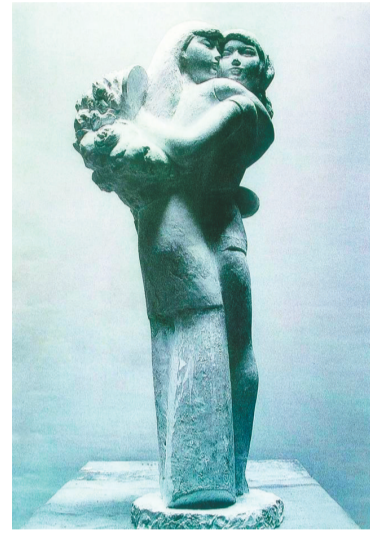
贺中令不仅创作出一批内涵丰富、贴近生活、讴歌时代、礼赞英雄的雕塑精品,他还身兼教育和培养雕塑后备人才的重任,使得我国雕塑事业后继有人,鲁艺精神薪火相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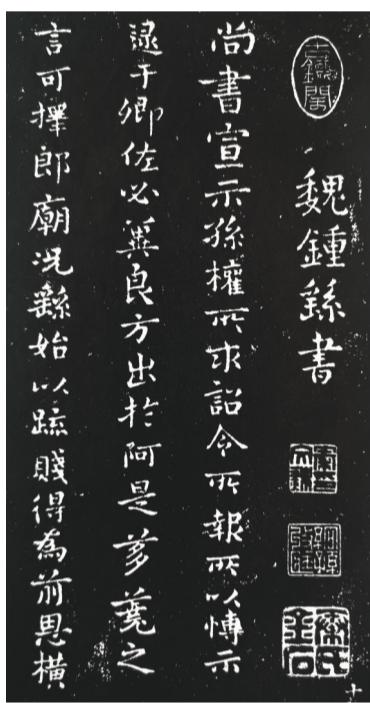
花岗岩雕《残历碑》(1991年),高18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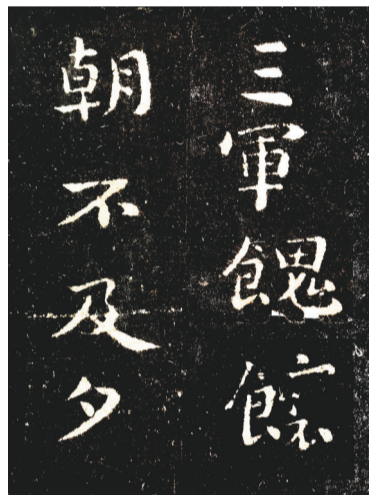
太湖石雕《米芾拜石》(2015年),高3.2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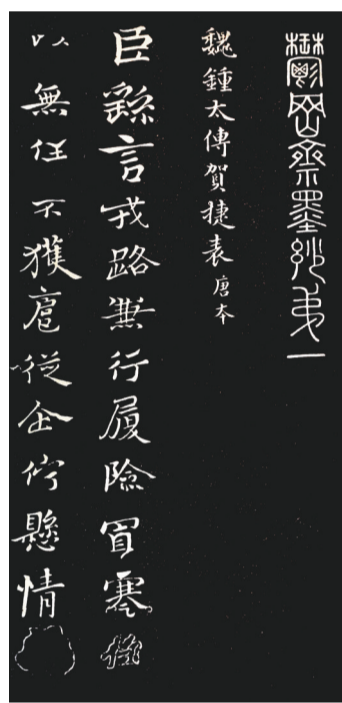
汉白玉雕《骨肉同胞》(1979年),高1.2米。



钟繇楷书《宣示表》局部



钟繇楷书《荐季直表》局部



钟繇楷书《贺捷表》局部

经典鉴赏 JIANDU

钟繇楷书:高古天然 典雅浑厚

本报记者 凌鹤

钟繇(151-230年)字元常,三国魏书家,颍川长社(今河南长葛)人。其正楷书法独步当时。所书天然古质,意趣典雅,笔法质朴浑厚,北宋时期即被尊为“正书之祖”。传世书作有《贺捷表》《宣示表》《荐季直表》《力命表》等,都为早期楷书的杰出代表。师法钟书,既是对传统的敬畏,也是书法创作的纯正途径之一。

因处书体变革时代,钟繇楷书带有浓厚隶意。小楷体势微扁,行间茂密,点画厚重,笔法清劲,醇古简静,富有一种自然质朴的意味。唐代评论家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曰:“真书古雅,道合神明,则元常第一。”钟繇自言:“吾精思书三十年,坐与入语,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,卧则书于寝具,具为之穿。”由此可见其矢志如一的钻研精神。

钟繇所书《宣示表》在笔法与结体上,呈现较为完善的楷书体态

和气息,点画道劲而朴茂,字体宽博而多扁方,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艺术特征。

善于吸纳钟繇书法精髓,融入自身创作,并在全国书法大展中多次获奖的当代著名书法家索民,在谈到钟繇楷书的启示时说:“历代楷书作品中,钟繇小楷无疑是最早、最具典型性的代表。历史上,他与王羲之并称为‘钟王’,标志着魏晋书法的高峰。我个人认为,钟繇楷书的可开发资源和丰富的信息量构成历代书家取法的关键。”钟繇楷书作为过渡时期的楷书典范,在结体、笔法上有太多不经意间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,带来高古神秘之感。钟繇的贡献在于提供给习楷者更多的个性空间和研究提炼的学术点,其传世名帖在结字、笔法取势、气息表达上各具神韵。

曾入选中国首届书法兰亭奖的吉林大学书法博士郭德军谈

道:“楷书是汉魏之际形成的新书体,钟繇是这一新体书的引领者,他的楷书对后世之影响经久不衰。王羲之的楷书即渊源于钟繇,后形成了新的面目。”

钟的楷书宽博,王的楷书结字内敛,字形修长挺拔,基本摆脱钟的隶意,当时被称为“新体”,评钟的楷书“古质”,王的楷书“今妍”。继王以后,后擅楷者如宋代的苏东坡、明代的祝允明、王宠、黄道周、清代的傅山、何绍基等大家均受其沾溉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群众学习楷书多从唐楷入手,“颜柳”热造成一定程度的视觉疲劳,于是人们开始上追魏晋楷书,推崇钟繇的高古,在全国书法展上钟体面目小楷不乏摘金夺银者。当代以楷书名世的书法家大多深研过钟繇楷书,他们或取其质,或取其势,或取其形,或提取其点画特征,成就个人书体风格。

艺术微论

说说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

凌鹤

艺术作品,无论是千古流传的经典,还是时代佳作,都会有一个规律: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。

这是说艺术家首重学问与人格修养,先培养器量见识,进而才是技艺的学习与展现,器识比技能更为重要。或者说得更通俗点,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,必先做一个有文化、有综合素养的人。

这个观点是中国近代文艺先驱李叔同的文艺观,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共鸣。李叔同具备绘画、书法、音乐、戏剧的综合才能,终生致力于“器识”的养成。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若没有“器识”,无论技术如何精通熟练,亦不足道,所以他常告诫别人:“应使文艺以人传,不可人以文艺传”。

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又与中国传统“重道轻器”的思想相统一。道与器之辨是长期以来一个哲学论题。“道”是中国最高的哲学范畴,具有包罗万象的统一性,是先天地而生的万物本源。与“道”相对的是“器”,指各种派生的具体事物,“形而上者之道,形而下者之为器”。

孔子讲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。“道”,即根本的精神、道理、原则,包含美善合一的境界、高洁不俗的人格、大爱观的人生态度。其次才谈得上“器”的层面,即技巧、技术的问题。

当代艺界呼唤回归传统,洗去浮躁,创作精品佳作。“重器识”应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与实践躬行,而实践躬行尤为重要。有了宽阔的胸襟、高远的视野、丰富的学识,笔下所生自然应和心灵之声,作品格调不会低俗,由此也就把真正的美播撒。

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,艺术是“据德、依仁”之事。



长白英石雕《白山魂》(1984年),高0.83米。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中国少年 老人之老

河岸欢乐的笑声
少长相融的重心
把春花与柔情一并入酒
岸上杨柳青
都是梦中人
坤宁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上海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